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农村研究网

Chinese rural studies



· 在线咨询 ·

- 蘑菇的种植
- 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
- 人口普查是为什么
- 该中心与研究生培养有关么
- 中国农村调查 · 2010年 ·

· 中心动态 ·

- 湖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
- 全国政治学专家团莅临中心..
- 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莅临中..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
- 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赴福建永..
- 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

· 新农学院 ·

· 调研基地 ·

《农村研究通讯》

《中国农村研究》

《中国农村调查》

· 新书推荐 ·



农民问题国际比较研究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农村新论](#)>>

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

作者: 朱新山 来源: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

摘要: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能长久维持, 在于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 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下渗, 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 剧烈分化与蜕变。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 除了部分继续钻研仕途外, 科举制度的废除, 原有上升渠道遭遇制度性解体, 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开了乡村政权的蜕化, 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结构格局难以维持下去。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渐次失效。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 小农不断发制和村落聚合力造成巨大冲击。小农的日趋贫困化, 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 使乡村社区总体性危机中, 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 绅士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

关键词: 社会结构; 传统乡村; 绅士; 解体

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组织机制

1840年中华帝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 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受到巨大冲击。力量的绅士精英向上流动的路径被切断, 绅士阶层发生分化、蜕变, 中国乡在科举制度废除前的典型传统乡村社会里, 处在社会底层的是无数生活过绅士精英, 在这里, 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 这是在。

自秦汉以来, 中国就形成了一套相当发达和完整的集权化的行政科层农所形成的分散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正如费孝通所言, 中国经济独立小农。[1] 和大庄园相比, 小农是较易控制的税收源泉, 在政治上对中始, 多扶植小自耕农的发展。[2] 公元5世纪以来的均田目的在于创造一种继朝代所沿袭。[3] 除政治上的限制外, 经济、社会等因素也制约着地产而来的是人均耕地面积的缩小, 如鲁、冀两省明初人口共约700万, 1800年从近20亩递减至4亩。中国的地产更因传统的多子继承制而趋小型化, 一自耕农的地位。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相伴随的, 是财富的社会分散掌握和求国家采取行动的压力。除防止地权集中、保持经济平衡外, 国家基本上小政府模式, 正式机构很难深入乡村基层, 只能到达县一级。

赋税征收是乡村和国家之间的主要交叉点, 中国是唯一从公元前迄至: 种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3] 47 明清两朝都限定和严格坚持是, 低额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行政费用。除窘迫的财政限制了国家的能力国家权力的下渗。从汉朝到清代中叶的两千年间, 相继各朝代的行政在汉朝末年, 一个县官管辖5万人, 到清末却要管30万人。常设民政官员不减了它的地方行政职能。在唐以后, 政府放弃了对城镇集市的官方管理, 向当地的事务。[4] 这样, 由于小农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其附着在土地高踞于地方社会之上, 统治者便设计一些措施来诱导民众实施一定程度的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绅士能够管理地方民众。传统乡村在组织机制上, 就出: 王朝高居于地方官僚统治之巅, 而在官僚统治下面则通过宗族关系和皇帝的官员从来不去大多数中国人民居住的乡村, 传统的中国在地方一级是族机制得到国家法律上的支撑, 法律总是维护族长、家长的威信, 并按亲属

传统中国在治理结构上就有两个不同的部分, 一是地方权威(乡绅, 其门, 主要在县以上区域活动)。这种治理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两种情况的结合理权的分离。在基层社会, 地方权威控制着地方区域的内部事务, 他们并不官府权威发生关系。表面上, 中央下达政令, 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正规渠道

各级人员中介变通处理，帝国秩序并不能真正触及地方管辖的事务。在这边界，除非在基层无法处理的事务才上达官方。[6]地方权威的自主管辖模式官制制度并没有承认这种分治局面，但事实是，分治的迹象随处可见。有了一个安全的隔层，即身处官民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绅士集团。

绅士是传统中国非官非民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他们享有制度赋予的刑罚、减税等优待，并有特殊的生活方式。[7]他们知书明理，在乡村建立提供社区保护所需的庇护关系，承担起社区秩序和社区凝聚的公共责任。理上的真空，成为官民中介，既是官治民的工具，又是民对付官的代表。绅绅士和小农三方都有利的互动均衡，从而形成传统乡村的超稳定结构。首围，确保传统中国始终维持间接治理的小政府模式，防止了国家政权的过度相恤，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和帮助小农抵御天灾人祸。再次，宗族自治与国的大舞台。最后，绅士借国家获取特权与地位，国家赖绅士维持基层秩序。透，反过来讲，国家也不允许绅权膨胀和宗族自治过分扩展从而对国家权威象，传统国家也维护小农的私有财产权，限制其他社会势力对小农田产的传

二、乡村绅士的分化与蜕变

传统中国的国家、绅士和小农三层结构形成两个相互分离的系统：一、绅士和小农构成的社会系统。两个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分化是相当清奏会系统是整个帝国体制的基础，绅士在三层社会结构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将矛头对准绅士阶层。皇冠虽然可以落地，但绅士与小农的结构关系依然复与重建。[8]绅士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绅士力量的和传统社会的走向。

身份建构包括主观和客观的两重性，既需要群体自身对其身份的主观性建构，[9]而有时后者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会基础的绅士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营仕途外，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科举制度废除，原有上升路。当时尚长期乡居的山西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清政府重商政策驱诱，绅士从商一时成为风尚。时局变动客观上也推动了物质条件优厚，一边是正途雍塞、中式无望。当时，贫民子弟当兵为糊口径。[11]

随着新学影响力的增强，绅士也在不断向新学界靠拢。他们通过新学绅士阶层的分流，未能对传统体制起到培根固本的作用，相反，他们日益成地位的跃升从整个社会基础上瓦解了传统社会士首商末的等级身份结构。中国社会改组引入社会平等取代社会等级的历史轨道，最终使包括清朝贵也不是一曲福音，新军吸引了不少乡绅，但新军思想开明，倾向革命。辛亥站在革命者一边。[12]绅士在新式学堂中更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近代思想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

时局的变动，科举制的废除，还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规模的单向迁移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事业的兴起，乡村绅士向城市的流动逐渐加剧。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阶层需求的新学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新后，只能在近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这样，有才之士从乡村不断流出，费孝通所称的中国乡村的社会腐蚀[13]年前，乡中有许多贡谷、秀才、读书六寸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时也观察到，一方面是农村最缺领袖人才，而乡村读书人向城市浮动已成善厌恶农村生活，都放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农村社会费了金钱来教育他袖，来作农村社会的改造者；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跑了，剩下一班没活？[15]社会腐蚀卷走了上层的养分，乡村大地日益荒芜。绅士阶层的外介力量的绅士阶层，在官、绅、民三层结构中，借助于科举制和等级制，不断地为帝国的官吏队伍提供后备力量，而且也持续不绝地吸纳平民阶层证着基层社区领导权有赖于绅士阶层。科举制度消亡后，绅士分子向城市向把持乡村政权的绅士阶层失去了最基本的力量补充，由此造成了乡村士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兴国县永丰区看到，当们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而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因其田产不够食，濮阳某村的一份调查报告说，1920年以前，村政完全掌握于旧式知识分子、长、佐、里排长，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枣行、盐行的东家、小股者受教育成分已明显降低。[15]山西举人刘大鹏也看到：民国之绅士多系

商、村蠹。[10]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与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权力较为普遍地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庸吏、包税人、赢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17]民国以后恶化,社会骚动变乱迭起,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乡村政权力量的蜕化

三、乡村原有组织机制的破坏与社会失序

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有赖于国家、绅士和小农结构之间的均衡不可少的外在条件。其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长期稳定。自秦汉至清末的两摆脱低水平循环的状况。其二,以礼治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形态长期稳定,未起。

然而,近代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瓦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其延续的稳定性来看,似乎达到了一定的平衡时,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机器时代给中国人带来了现代化,同时,中国被迫现代化。[13]现代工业给予西方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倒农业文明的力量,在西方生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国家必然要肩负起现代化之责,加强国家必定引起最为敏感和唯一的知识阶层绅士集团的率先分化。西方现代工业小农经济的基础,导致乡村社会持续动荡。这样,传统乡村既有社会力量

国家政权不断扩张和向乡村的持续下渗,使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系列机构设置和委任,变乡土地方权威为国家在基层的政权分支,使地方权威官僚化的进程,事实上触及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框架,使乡土地方权威公共身份的授权来源转移至官府系统。[6]其结果是,地方权威民众的责任弱化了,剥削性增强了,乡村社会整合结构逐渐解体。传统乡绅他们通过保护型的角色,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维持基层的社会秩序。这个过程,意味着一个冷酷的压榨机器压到村庄头上,迫使原有村庄领袖必须在一种情况下,顾及自己在村民中地位的乡村领袖是无法保持其领导地位过程出现的地方上的新权威(如区长、村长,晚清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能不从政府和农民双方从事掠夺,成为赢利性经纪。因此,随着作为中介的绅士的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的自治机制受到深刻触动,官民之间丧失了至关重要。缺乏任何形式的阻拦,高居人民之上的官府就变为直接入村的赤裸裸些情况下可能是真独裁的,然而这种制度的理论是建立在道德权威上的。下渗的国家权力,既无道德约束,也缺西方那种大众检查机制,结果就变为忍时,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

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小农不断发生分化和贫困化,也对传统乡村自清初无论华北与江南,均以自耕农经济为主。然而,在随后的三个世纪中,半雇农的方向发展,江南的小农经济则向佃农的方向迈进。自耕农的生产有切身利益关系,因而是村庄组织的骨干。贫农因失去了土地,而在村庄组织中不再关心村内公共事务。那些长年在外的佣工,更是逐渐与本村疏远。天然领袖,原来以士绅名流为中介的上与国家、下与地方社会的政治利益因而,自耕农一旦分化为上层的地主、富农与下层的贫农、雇农,村庄组织

另外,小农的日趋贫困化,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重组。到20世纪30年代,农民的半无产化普遍发展,如华北地区45%的农场亩15亩。[2]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

小农的贫困化,会改变他们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弱化对国家的支持。革命运动。作为与宗族和村庄集体关系较松散的人,贫农也比中农容易们只能抛弃土地。但是一旦离开了土地,他们本身也甩掉了土地的束缚。有革命性质。20世纪初年,在许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惊人,陕西某县高[12]到三十年代,情况更趋严重,农民们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困难的浪潮就像无尽的波涛,无论时间流失多久,同样的情景依旧发生,[19]

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使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中国传统村而来的,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此,城市和乡村的建乡文化一体,人才始终不脱离草根,财富在城乡间有机循环,并不大规模外象,接受现代文化的新精英倾向城居,越来越难与农村利害一致。以修齐齐机会主义价值观在新精英中广泛生长,他们与农村日益隔膜。同时,社会对乡村的单向剥削,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农村经济的衰落相平行的社会精英和社会财富向城市的单向迁移不断加剧,中国农村日益凋敝,传统

到20世纪上半叶,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严重失衡,组织机制破坏,乡村的冲击下,逼得农民起来造反,生活、经济、政治和道德的种种问题摆在

然成为革命的对象, 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与改革。[13] 在这种情况下, 应运用
民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 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 并以组织农民为突破口对农